

■“田野”上的半边天·三八妇女节特别策划

编者按

现代考古学在20世纪初叶传入中国,由于它的“田野性”特征,使其从业者更多地倾向于男性。然而,我们伟大的女性从中国考古学诞生起便不愿游离于这门新兴学科之外,近代中国就诞生了两位考古学女性学者——曾昭燏和游寿;新中国成立后,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其中,到如今女性已经实实在在撑起了中国考古的“半边天”。在“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我们特意推出一组专题,一起走近那些曾经和正在战斗在一线的女性考古工作者,并向她们致敬。

一张“小纸条”揭开“千古之谜”

——我国第一代女考古学家游寿与嘎仙洞遗址的发现

□王立民

北魏先祖石庙之谜

北方,这是一片令许多史学家、考古学家神往的地方。水草丰足的草原哺育了彪悍的游牧民族,而这些民族又屡屡南迁,统一中原,与中原汉民通婚、融合,建立强盛的帝国。

居住在大鲜卑山的拓跋鲜卑由山林而逐草原大泽,世代演化,强壮的体魄以铁骑长矛征服了中原,建立了北魏王朝。

北魏真君四年(公元443年),北方难水旁的臣国乌洛侯国派使臣到北魏京城平城进贡。《魏书·礼志》记载:“魏先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

乌洛侯国的使臣说:我们乌洛侯国的西北部有北魏先祖居住的石庙,周围的人民经常在石庙祈请老祖宗保佑风调雨顺、人畜兴盛。而且这些祭祀都很灵验。

或许是为了证明自己与鲜卑族的血脉相连,或许是为了纪念自己的祖先,或许是让先祖的神灵庇佑国家的昌盛,北魏皇帝拓跋焘命“谒者仆射庠六官中书侍郎李敞”率人长途跋涉来到北方的大山中,在祖先居住的山洞前进行祭祀,又在山洞石壁上刻下祝文,以记录此事。

岁月悠悠,北魏先祖石庙究竟在哪里?

中外考古学家为此进行过大量的考证,正如王国栋先生在《大鲜卑山,大鲜卑山》一文中说的那样:“如以北魏京都平城(大同)为基点,往北四千里去寻找,把各家之说排列起来,恰好成为一条以四千里为半径的弧线。弧线的西端在贝加尔湖,中间是呼伦湖,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东端是嫩江。由西到东,相差何止数千里之遥?茫茫大地,哪里是石室的真正所在呢?”

此中,只有游寿先生的推断被后来的考古发现证明是正确的。

“小纸条”的指引

游寿(1906-1994),女,字介眉、戒微,汉族,福建省霞浦县人。和曾昭燏同为我国第一代女考古学家,也是著名教育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和书法家。游寿是研究上古史的,同时对北魏史、北魏文学史更是倾注着热心,因为她写碑碣、看墓志,对正史的补充不可低估。正是这种对于北魏史精深的研究,促使着她想要捕捉到北魏祖先鲜卑族的发祥地,先生说:“我来到黑龙江后,首先要实现的考古目标,就是要弄清各族的原始。”

正是在游寿先生的提示之下,原呼伦贝尔盟文物站站长米文平发现了这一“千古之谜”。

米文平先生在《大兴安岭鲜卑石室是怎样发现的?》一文《缘起》一节一开头写道:“那是1979年2月,在黑龙江省考古学术讨论会上,哈尔滨师范大学七旬高龄的老教授游寿同志,热情地向我了解呼伦贝尔的情况。谈话间,她问我:‘呼伦贝尔大兴安岭一带,发没发现石室?这个石室是《北史》上提到的。’我觉得呼伦贝尔大草原和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历史上只是一些游牧部落在那里活动,怎么能有‘石室’呢?当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这一带据我了解不会有‘石

嘎仙洞,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20里大兴安岭顶端。作为一个天然的山洞,或许它只带给人们一种威严的神奇。在山洞石壁上刊刻着19行201个古茂雄浑的魏书,却揭开了拓跋鲜卑民族神秘的起源,一条多少学人未能确定的山脉位置——嘎仙洞所在地:大鲜卑山。这一千古之谜的破解,我国第一代女考古学家游寿先生居功至伟。



游寿(左二)和考古界同仁在嘎仙洞合影。

室’。”当时,游寿先生并不认识米文平,只是因为这次会议在讨论鲜卑族考古问题时,米文平提出:在内蒙古(包含嫩江流域)许多地方出现墓葬,和别处不同,可能是鲜卑族留下的。游先生回忆说:“我静听了他的发言,想到拓跋魏太平真君四年的祝文,可能就在这一带。我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近20年中,每遇到嫩江来的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问他们看到过拓跋魏旧居‘石室’没有?”“在那次会议后,我单独约米文平同志一谈,问在嫩江有无看到‘石室’的建筑,如果找到这‘石室’,鲜卑族祖居就可以定论。”

游寿先生怕自己的福建口音别人听不懂,又在笔记本上写下“石室”两字,扯下来让米文平看。

王国栋记载:“拿着纸条,米文平一时还摸不着头脑,问:‘什么石室?’游寿说:‘祖庙!就是《魏书》里那个拓跋鲜卑的祖庙啊。’米文平摇摇头:‘没有。如果有石祖庙我应该知道。大兴安岭过去的游牧、游牧民族并不定居,哪来的石室呢?’……哈尔滨会议结束,米文平回到海拉尔。一次,整理材料时无意中从笔记本里又翻出游寿教授的那张纸条:‘石室’二字龙飞凤舞,又引起他的沉思。”

初涉考古界,米文平对鲜卑史也仅仅是初涉而已。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偶然的机遇,使他向“千古之谜”靠近了一步。

米文平以“石室”可能是山洞的大胆猜测,开始对已知的山洞进行排查,但一无所获。

王国栋说:“正当他的石洞猜想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一个意外的消息又使他振奋起来。呼盟文化局副局长白桂兰到最边远的鄂伦春旗去检查工作。淳朴的鄂旗人非常热情,曾请白局长走游了一个大山洞。

这个山洞本地人叫嘎仙洞。“嘎仙”据讲是鄂伦春语,意为村屯;也有说是满语嘎姗之转。

路上,陪同前去的本地同志绘声绘色

地向局长讲了一段嘎仙洞的神话传说。传说这儿有一位叫嘎仙的鄂伦春英雄,力大无比,在山洞里曾与恶魔满盖决斗,终于战胜了满盖,从此这里的人民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听了故事,白局长兴致勃勃地在洞里观赏一番。真山真水,野趣十足。回到海拉尔后,上班在办公室里为大家讲嘎仙洞的见闻。正巧米文平在场,他打听了石洞的规模,马上联想到鲜卑石室,于是脱口而出:“洞里还有字!”大家一笑,谁也没在意,事情就过去了。

米文平却记在心里。八月末,他与程道宏、王永祥两人乘15个小时的火车来到阿里河。到镇上与鄂旗文化科联系之后,又找



《嘎仙洞西壁摩崖刻石》拓片双勾本局部。

了一名鄂温克人做向导,于9月1日早乘汽车直奔10公里外的嘎仙洞。”

经过对嘎仙洞的一探、二探、三探,到1980年7月30日午后三时三十分第四次探查嘎仙洞。米文平在石壁上发现了文字。

为什么游寿推断正确

游寿在《大兴安岭嘎仙洞发现鲜卑洞穴摩崖十年记略》中说:“拓跋魏太平真君四年鲜卑族在大兴安岭的祝文,已发现10年。从1980年至1983年,关于嘎仙洞的发现,先后发表的论文计53篇。有许多同志,约我把发现嘎仙洞祝文的原始经过谈一谈。我已看过了许多同志的论文,都是在发现鲜卑族坐标有了着落之后写的。因之许多同志问我:何以敢于肯定在嫩江流域去找呢?”“据《魏书·列传》记载,勿吉等以下各族有个乌洛侯,他向太平真君说:‘国家先帝旧居,且有神灵。’又本传:‘小水皆注难。’(“嫩”、“难”同音)必在嫩江。米文平同志很热心,随即在大兴安岭考察,发现有大洞穴,是鄂伦春人狩猎游憩之所。1980年经三次上山考察,最后在太阳将西斜时的反照中,发现壁上有个‘四’字,于是同行同志把壁上的封苔揭开,文字出现了。”

游寿先生推断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乌洛侯国使臣在太平真君四年来朝时,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北魏)先帝旧墟(石室);而乌洛侯国的地理位置是:“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魏书·乌洛侯传》);而古代“难”与“嫩”相同音,“小水皆注于难”的“难水”必是嫩江,所以,鲜卑石室必在嫩江流域。由于游寿先生年事已高,在高校任教又有别于田野考古学家,所以心情很急切,“近20年来,每遇到嫩江来的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问他们看到过拓跋魏旧居‘石室’没有?”;米文平同志即是谈到内蒙古(包含嫩江流域)的墓葬考古问题,才引起游寿注意的。只因为这个思路长期在游先生的头脑中徘徊,故而有了游寿与米文平的谈话,有了游寿手书“石室”二字,有了米文平先生的热心和艰辛、偶然和必然,有了嫩江流域大兴安岭北段顶峰东侧的嘎仙洞;嘎仙洞里的祝文又证明了此即为鲜卑祖居石室。这最后一点的证实,又反过来证明了游寿先生的思路是建立在上古史、北魏史和文字学上的科学的推论。

北魏石刻祝文的发现被列为我国重大考古成果而载入1981年《中国历史学年鉴》。新华社评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长城以北地区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为史学界研究鲜卑史乃至北方民族史,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光明日报》载文说:“为拓跋鲜卑的发源地和其远祖的口碑史料的可信性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释为“勇敢”的洞穴已拂去了千年的尘埃,但要真正地了解它,还需要更久,更久。

如今,这项重大的历史发现,已被载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如果没有米文平的这项发现,鲜卑拓跋部发源地将继续是一个千古之谜。但是,如果没有游寿先生在黑龙江考古学术讨论会上对米文平有关“石室”的提示,这项发现也许会向后推移几十年、几百年,或许永远不能成为现实,那么,现在的中学生就不可能在教科书上知道鲜卑拓跋祖庙石室——嘎仙洞。